

7

性質	
編號	2417

地方党史資料

名 称:

类 別:

作 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安東地區民主政權建設情況

1888—1889

(卓 志)

安東地方黨史編纂會辦公室

1880年9月20日

說 明

我們汇编这个材料的目的，一方面要把現有資料清理一遍，同时提出下一步搜集的意見；另一方面要把初步搞到的一些情况提供給省党史編委办公室，同时也請市党史編委先审閱一下。由于目前占有資料太少，而且大部是敌伪的資料，其可靠程度还待研究認定，又加我們水平所限，因此这个材料不仅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安东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且，缺点和錯誤也一定不少。請市党史編委及熟悉安东地区情况的同志給予指正，以便进一步补充和修改。

安东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1960年9月20日

目 录

一 安东地区封建社会末期的基本情况.....	1~7
(一) 历史沿革概况.....	1
(二) 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	3
(三)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5
(四) 封建社会末期安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	6
二 安东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工人阶级的壮大.....	7~16
(一) 民族商业的发展.....	7
(二) 民族工业的发展.....	9
(三) 工人阶级的壮大.....	13
(四) 工人阶级的特点及运动的概况.....	14
三 日帝对安东地区的侵略及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	16~30
(一) 日帝对安东地区的政治侵略.....	16
(二) 日帝对安东地区的经济掠夺.....	20
(三) 民族经济遭到的摧残.....	25
(四) 日伪对安东地区的残酷统治.....	26
(五) 广大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	28
四 为建立民主政权、打倒封建势力，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 前綫而斗争.....	31~35
(一) 第一次解放和战略退却.....	31
(二) 第二次解放和反封建斗争.....	38
(三) 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34
(四) 支援前綫.....	35

一、安东地区封建社会末期的基本情况

(一) 历史沿革概况

安东地区早在周朝时期就属于中国版图，战国时属燕、秦朝时属辽东郡。从这以后，它一直是封建制度统治的包括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三种形态的落后地区。安东地区原是满族聚居的地区，满族从努尔哈齐起（1616年）才完成奴隶制变革，到了清世祖入关以后，安东地区的封建关系才慢慢的发展起来。因此，安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关内开化较早的地区对比是缓慢的，落后的，封建社会大约只延续了二百年之久（？）。

安东地区自明朝经过两次“开拓”以后，随着各地城堡的建立，开垦之土地与年俱增，生殖日繁，到十七世纪初期，辽东首府——宽甸境内居民曾达到六万四千余户。此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强其本族人力和预防后顾之忧，曾采取了“定边”政策，把所谓“十字街”（今安东县境内）以东划为“禁区”，定有“禁止农牧、禁止渔猎、禁止採伐、禁止採矿”的四条禁律，並到处派兵防守，不准人民出入“禁区”，因而使安东地区与内地隔绝，长期以来人烟寥落，土地荒废，但确抚育出一片漫无边际的森林和人参、鹿茸等名贵产品。

1871年（乾隆六年）以来，开始有许多汉族农民潜出山海关或渡过渤海湾来东北从事开垦。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辽（阳）复（县）海（城）盖（平）等地居民逐渐向岫岩、凤城一代移居。道光末年有山东和河北人偷入鸭绿江下游“禁区”内採猎，有採集一年“易金数万”者，更引起各地特别是山东人的注意，乃相继而来。

从乾隆年间开始，由于清朝^族貴和官^族地主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压

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清朝政府施加了一系列的压力，加之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和捻子军在北方几省的活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朝政府被迫开始筹划利用“禁区”的富饶资源来“归化流民”，以图减轻国内的反抗力量。1867年（同治六年），清朝政府派员“出边查勘”，在近边一代准许升科熟地五十余万亩，并于1874（光绪十三年）规定“东边地代全都开禁”，第二年（光绪元年）又在调集大批兵力来安东地区进行镇压的同时，把“凡畝地耕种者，无论旗民一律编入户口册籍”，并派员在安子山（今安民山）各处开办土地升科和纳税事宜。1876年（光绪二年）清朝政府为谋经久之计，在安东地区设置了宽甸县、安东县（今安市市、县），岫岩州和凤城厅，並以凤凰厅为首府，管辖岫岩、安东和宽甸三地。

安东地区自各县设治以后，由于水土适宜，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因而山东人接踵而来，除了垦荒以外，大都以採伐和經商为主。随之鴨綠江与浑江流域盛产之药材、木材、大豆、粮食、宗尾毛皮和山货等开始云集，貿易日益兴盛，人口趋向增加。1877年（光绪三年）清朝政府在大东沟設立木稅局，承認木材採伐合法，並以此为华东一代的木材供应地。1882年（光绪八年）清朝政府与朝鮮訂立了“中朝居民水陆貿易章程”，第二年又訂立了“中江通商章程”，遂于九連城設立“中江台稅務局”和开辟市場，在中朝两国边境进行小額貿易，因而也推动了安东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經濟的发展，特别是在1

894年(光緒二十年)以來，制油、制材、鐵工、印染、制革、繅絲等工業和雜貨棧棧、木棧、絲茧棧等商業陸續出現。(見“簡明中國通史”、“祖國的安東”)

(二) 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

在封建社會末期，地主階級和高利貸資本對貧苦農民的壓迫剝削是極其殘酷的，而且剝削手法越來越多，剝削量也越來越大，土地兼併更是日趨嚴重。許多自耕的貧苦農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喪失了自己的土地，而淪為佃農和僱工。

在封建社會末期，安東地區農村土地佔有情況是：地主階級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但卻佔有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而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中農、貧農，僅佔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土地。如鳳城縣在1936年共有農戶63,090戶，其中地主(富農)為18974戶，佔百分之三十，中、貧農44148戶，佔百分之七十，全縣耕地面積1,129,512畝，其中地主(富農)860,536畝，佔百分之七十七，中、貧農268,976畝，佔百分之二十三。安東地區大地主的土地佔有情況，如：安東縣大東街石佛村大地主姜春波(他祖父是從1870年以來靠欺騙剝削和壓榨農民發家的)佔有土地三千三百餘畝，~~多~~塘一千五百餘畝，石佛村有230~300戶赤貧農要租種他的土地，向他借錢借米，受他的剝削。又如：安東市郊區接樹鄉大地主蔣奎安，佔有土地80多天，全鄉有30多戶佃貧農租種他的地，也要受他的壓榨。

封建地主對農民剝削的主要形式是收地租，有實物和貨幣地租

两种，原先是实物地租，后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业的发展，也大量地出现了货币地租。这种剥削是通过契约规定下来，佃农要租地主土地，必须立下字据，並找人担保。

安东地区的实物地租，在1910年以前一般是：上地，地主六分，佃农四分；中地，地主五分，佃农五分（即对半分）；下地，地主四分，佃农六分。货币地租是：上地（亩）三元；中地二元；下地一元。而当时土地的买卖价格是：上地（亩）五十元；中地三十元；下地二十元。宽甸县1926年货币地租是：上地（天）五十元（奉票）；中地四十元；下地三十元。凤城县1931年以前，实物定额地租（即死租子）：上地（天）二石~二石五斗；中地一石五斗~二石；下地一石~一石五斗。

不仅如此，封建地主为了大量地吮吸农民的血汗，在放债和收租的过程中还利用“大称进，小斗出”等各种苛刻办法进行搜括。同时，还把繁重的苛捐杂税，诸如地捐水利税等等都转加在贫苦的农民身上，使他们受尽了剥削和压榨。如：安东县大东沟石佛村大地主收油草时用十八两的大称，一斤多二两，80斤就多10斤；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粮，用小斗，每斗少半升，而且还高于市价。

此外，封建地主对贫民的超经济剥削也甚残酷，农民除了向封建地主交地租以外，在租地主土地时，首先要请“东家吃饭”，对佃农来说这叫一种“破费”；还得为地主代耕一部分距租地较近的土地，不给任何报酬，收获的粮食全归地主所有；至于给地主挑水、劈柴、拉脚和做其他另活，就更是经常的事了。

放高利貸，也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一種手段。貧苦農民在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一年勞動所剩無幾，甚至有的連地租都交不上，為了生存，他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錢、借糧，在一般情況下收四分和五分的年息；但在貧苦農民特別急需的時候，封建地主高利貸者便乘人之危從中取利，要大加一的利息（即農民通常所說之“駝打滾”）一年借債本利平，這種“駝打滾”的高利貸，如同惡魔^魔一樣^記的在貧苦的身上，甚至有的幾輩子都還不清。

受僱于地主的僱工，其受地主壓迫之甚及其生活之苦，更是令人無法忍受。給地主干活，“雞叫為亮天，不上燈不吃晚飯”。每天勞動長達13—18小時；風雨無歇，“刮風抬石頭，下雨挖水溝”簡直才有喘息之機。這還不說，如稍有怠慢和差錯“東家”非打即罵，而其所得却少得可憐，實難維持最低生活。由於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使廣大農民陷于了“家無隔日米，身無遮體衣”的災難深重的困境。“糠菜半年糧”就是大多數農民生活實況的寫照。

在封建社會末期，地主和高利貸者對農民的剝削，無論就其形式和手段以及從剝削量來看都遠遠超過了過去的任何時期，因而它不僅加劇了農村的階級分化，而且也阻礙和限制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見“鳳城名營子滿族社會歷史情況調查”、“鳳城縣事情”、“滿洲事情”，和“南滿重要都市及其背後地”）

（三）農民的反封建鬥爭

為了反抗封建貴族和地主的壓迫和剝削，為了打破封建統治的枷鎖，安東地區廣大農民與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曾經進行了英勇

的不屈不撓的反封建斗争。1863年（同治二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殘酷镇压，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首先有徐五等集結千余人，在岫岩和安东一代抗拒清兵达四年之久。同治中年，又有高希田、宋濂和宋三好等千余人在大东沟、沙河鎮（今安東市）以及凤城、寬甸等地“私立銀捐鋤稅”以反抗清朝。1907年，清朝政府为开稅源，便由奉天派官到凤城丈量山荒，並确定每百亩征五十两銀子，因額巨，农民难以支付，激起农民的不滿，这时，由範化南、伊品山、刘春一等以“轉片”联系与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斗争。10月21日，由伊品山、陶景凱率領200多农民进入凤城，选出代表与官府說理，要求廢除不合理的山荒稅。当时县同知一百接見群众假意表示协議免稅，一面密令警察夜襲手无寸鐵的农民，當場打死二、三人，农民被迫出城返家，以失敗而暫告結束。次年二月因山荒稅沒有明令廢除，斗争再起，又以“轉片”联系，凤、安、岫三地，农民一致响应，拟与官府进行长期斗争。首先封鎖了凤凰城，不准粮米柴草进城，历时二十余天。县同知採取武裝镇压，派軍警打死三、四人，更加激起了农民的憤怒，同时也引起城内工商界的同情，他們派代表进京申訴，在广大农民不屈不撓的斗争压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廢除山荒稅，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見“祖國的安東”、“凤城后營子滿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

（四）安東地区封建社会末期的特点

安東地区封建社会末期的特点是：

1. 在封建社会末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但由于外

国帝国主义的侵入，这个经济基础便被破坏了，但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不仅保持着，而且还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安东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佔居了统治的地位。

2. 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但它的力量是脆弱的，在还没有成为安东地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的时候，便遭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压榨和排斥，因而它有反帝斗争的一面，但由于它力量的脆弱，因而与外国帝国主义又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3. 在封建帝王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他们勾结在一起统治与压迫安东地区人民。

4.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就掌握了安东地区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操纵了安东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开始统治与压迫安东地区人民掠夺和搜刮安东地区丰富资源。

5.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下，安东地区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日益贫化困，工人沦为奴隶，农民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见“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

二、安东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工人阶级的壮大

（一）民族商业的发展

据记载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有山东人和回族人来安东地区经商。道光末年由山东和河北人偷入鸭绿江中下游“禁区”内，採集人参、鹿茸及平贝、升麻、五味子等药材，闲时则砍伐树木编制木排，以大东沟为集散地，每年初夏四方商贾云集，收买药材、木材运销各地，並

結“木把”以各种必需品。1847年（光緒初年），安东县治設置于沙河镇，当时仅前巨宝街北隔有三、五商戶，坐待木把来鎮交易。这就是安东地区民族商业萌芽和初步得到发展的时期。（見“祖國的安东”“安东县誌”）

自从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安东地区。1907年安东开港，1912年11月2日日帝改筑安奉（沈）铁路竣工。随着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以及人口不断的增加，安东地区民族商业也日益兴盛。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均忙于战争，日本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因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安东地区民族商业有了較快的发展。据1926年統計，安东县（不包括市及大孤山）有商业153家（入商务会的約有100家），其中有杂货商45家，船行2家，当舖2家，药店8家，綫繩舖8家，鮮果特1家，沿場2家，銀号1家等等；大孤山商业有150余家，其中主要店舖有五、六十家，另外，还有銀市、綫市、草市、綫多市、公佐局等等；岫岩县商业（包括工业）有351家（入商务会的有280家；寬甸县商业（包括工业）入商务会的320家，城內有128家，其中有杂货商18家，油房1家，織布厂1家，染房1家，药舖3家，当舖2家。这些商业主要经营范围是：一方面把安东地区特产，如柞蚕茧、柞蚕丝、大豆、豆粉、豆油、木材、米等銷往日本、大連、山东等各地；另一方。从日本、大連、奉天（沈阳）、上海、山东等地运进杂货，棉布、麦粉、石油、燒酒等本地銷售，供应人民生活需要。（見“南滿洲主要都市及其背后地”）

到1933年安東市、縣商業，入總商會的有2,581家，寬甸縣商業入商會的有190戶，鳳城縣商業入商會的有76家，岫岩縣商業入商會的有306家。（見“滿日年鑑”）

到1935年末安東地區商業共有3,344家，總資本金72,433,297元，使用人員33,470名，全年銷售總額48,530,792元。其中：安東2,591家，資本金71,780,154元，使用人員22,440名，全年銷售額1,841,710元；寬甸縣440家，資本金290,513元使用人員2,428名全年銷售額1,841,710元；鳳城縣314家，資本金422,630元，使用人員1,602名，全年銷售額2,623,487元，岫岩縣缺。

在上述資本金總額中包括(1)滿洲中央銀行安東支行3,000萬元；(2)中國銀行安東支行2,500萬元；(3)東邊實業銀行150萬元；(4)協成銀行出張所100萬元；(5)滿洲銀行出張所1,000萬元，總計6,750萬元。（見“省政彙覽”）

(二) 民族工業的發展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安東地區就逐漸地興起一些小型的資本主義手工業作坊，如双合棧油房，（1883年設立）資金40,000兩；盛興爐（1894年設立）資金500元，從業人員10名；德隆盛皮鋪（1896年設立）資金3,000元，從業人員30名；吉興藥房（1889年設立）資金1,000元，從業人員24名。此外還有一些較小的木匠鋪、鐵匠爐等，他們生產出各種手工業產品，滿足本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

1910年安東市民族工業有製粉、棉織、染房、香局、紙局、

繅絲、熟皮、銅器、銀局、銀爐、製糖、鐵爐、泥盆窑、磚窑、石灰窑、油房等16个行业，121戶；其中：製糖鋪戶數最多（28戶）繅絲房戶數最少（1戶）；資本金總額為銀206,470兩（缺繅絲房），其中：最多的為20,000兩（興盛棧、油房等3戶），最少的為10兩（洪盛德繅絲鋪等2戶）；從業人員1,307人（缺石灰窑），其中最多的100人（繅絲房和磚窑），最少的2人（滿慶東製糖鋪等4戶）。年生產總值941,700兩（缺石灰窑和鐵爐），其中最高的54,000兩（七里絲廠）最低的400兩（謙源盛熟皮鋪等4戶）。（見“滿洲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安東地區民族工業也有了較快的发展。从安東历史較久，比較发达的制材、制絲、制油三大工業看：

(1)制材工業：1917年15家，年制材988279尺縮，1918年发展到19家，資本金為869,000元，年制材量達1,089,880尺縮。1920年達到30家，資本金為9,447,000元，年制材量为1,420,088尺縮。动力改用蒸汽和电气，1918年930匹馬力，1920年发展到2,740^匹馬力。（見“安東經濟時報”第六号）

(2)制絲工業：1914年6家，資本金39,560元，機器2,575台。1918年发展到29家，資本金351,860元，機器8,519台。1920年達到63家，資本金535,160元，機器18,542台。（“商業月刊”第一期二集及“安東縣志”）

(3)制油工业：1912年15家，年加工大豆182,296石，年产油6,494,250斤，年产饼1,432,000片，1918年发展到24家，年加工大豆442,112石，年产油17,272,500斤，年产饼3,454,430片。1920年达到25家，年加工大豆643,580石，年产油25,590,802斤，年产饼5,628,932片。（“安东大豆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安东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因而人们都称这个时期为安东地区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1926年安东市民族工业共315户，较1910年增加160%，3%，资本金6,963,730元（缺26家油房数），工人4,219人（缺51家棉坊，26家油房，17家棉厂，5家火柴厂，24家制米厂，14家麦棒帽厂数）。（见“安东工场一览”）

1930年安东市民族工业状况是：繅丝场36家，资本金527,300两，机器9,662台，作业日数6,976日，生产能力：本厂丝5,015捆，架片丝1,855捆，生产价值达1,948,900两，挽手799,862两；油房21家，机器台数：水压式208台，螺旋式1,521台，楔式41台，日生产能力：豆粕58,726枚，豆油268,630斤，1928年实际产豆粕4,114,000枚，豆油22,570,000斤；此外，尚有皮革、染色、炼瓦、火柴工业等等。（见“安东附属地概况”）

1935年，安东地区工业共有787家，其中：安东市、县555家，宽甸县81家，凤城县81家，岫岩县70家。资本金总额为1

，695，882元，其中：安東市、縣1，523，292元，寬甸縣63，000元，鳳城縣98，190元，岫岩縣11，400元。使用人員計17480名，其中：安東市、縣13，124名，寬甸縣647名，鳳城縣663名，岫岩縣3，049名。年生產總值13，019，667元，其中：安東市、縣12，198，303元，寬甸縣166，524元，鳳城縣708，670元，岫岩縣346，170元。（見“省政彙編”）

1936年8月，安東附屬地外工業分類如下：(1)金屬工業21家；(2)機械器具工業19家；(3)鑛業24家；(4)紡織工業148家；(5)化學工業49家；(6)飲食品工業50家；(7)染工業94家。共計410家，較1926年增加30%，其中主要工業有：柞蠶絲工業43家，油房23家。（見“盛京時報”康憶八年八月廿三日）

1940年，安東市內民族工業有柞蠶絲、絹綢、棉織、針織、印染、刺繡、鑄物、制紙、制腊、制革、橡膠、釀造、粉房、糧谷加工、制果、制材、木器、印刷、皮革制品、縫紉、制帽、布鞋等44個行業，共510家，較1936年增加24.4%，職工達12，018名。

在上述工業中行業比較大，而且集中的有：柞蠶絲業63家，職工1，819名，絹綢業40家，職工1，507名，棉織業71家，職工2，992名，針織業40家，職工1，039名，印染業19家，職工359名，機械業23家，職工334名，制油業14家，職工289名，木器業41家，職工621名，印染業12家，職工503名，火柴業3家，職工284名。（見“滿洲國工場名簿”）

安東市內民族工業，在日本經濟侵入後，從戶數看雖有所增加，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相比較，這種增加還是相當少的，從1910年—1926年，增加160.3%，而從1926年—1936年僅增加30%。另外，我們不能只看問題的表面，而且還必須看問題的實質，從這一點說，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在日本的排斥與打擊下，民族經濟是日趨衰落的，生產水平是顯著下降的。（見“民族經濟遭到摧殘”題）

（三）工人階級的壯大

安東地區的工人階級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著資本主義手工業作坊的產生與發展，而相應產生並逐漸成長壯大起來的，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和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1910年在安東市內製絲部、繩索部、柴房、沓局、紙局、繅絲房、熟皮部、製漆部、銀局、銀爐、製糖部、鐵爐、泥盆器、磚窖、油房等16個行業做工的工人階級就約有1,000余名。（見“滿洲事情”）

1926年，安東地區民族工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因而工人階級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並不斷成長與壯大起來，僅安東市內棉織、金織、印染、鐵工、制革、釀造、木器、制材、其他工業等九個行業，職工即達4,219名，如果把制絲、繩索、制油、火柴、制米、制帽工業等行業估計上，大約有20,000名左右，其中繅絲工人佔二分之一。（見“安東工場一覽”及“安東9種工業”）

1935年，安東地區民族工業在日本的統治、排斥與打擊下，日漸萎縮，紛紛倒閉，工人大批失業，繅絲工人在1930年以前